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

□何德旭 张雪兰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2025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并强调“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支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支撑作用、杠杆作用、牵引作用日益凸显，其功能发挥的深度、广度和精度直接影响着扩大内需的成效。做好今年经济工作，需充分发挥金融作用，特别是要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扩大内需的适配性和可持续性。

关键是优结构强传导促循环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总量指标既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也体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总量增速的自然回落已成为必然。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未来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致的”。这在客观上要求金融支持扩大内需需要从规模驱动转向质效驱动，不再片面追求社会融资以及信贷在规模上的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资金投向的精准性、政策传导的直达性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这一转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国内扩大内需仍存堵点，居民储蓄率处于高位，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中长期信贷供给的匹配度不高。对此，仅靠总量宽松难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必须通过优化结构（如提升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占比）、强化传导（如理顺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机制）、促进循环（如促进资金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良性循环），使金融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和重要保障。

更深层看，这一转向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要素投入规模扩大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金融支持就必须从“保总量”转向“提效率”。优化结构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质量，

需将资金引导至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避免资源错配到低质低效领域；强化传导有助于提高政策落地效能，需通过优化政策性金融工具、强化考核激励、完善尽职免责机制，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促进循环有助于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需打通阻碍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的堵点卡点，既通过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扩大服务消费供给等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又通过稳定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民间投资、盘活存量资产提升投资效率，夯实消费、投资、就业、收入动态平衡的基础。可以说，优化结构是提升资金使用效能的前提，强化传导是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促进循环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唯有协同发力，才能使金融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加速器”。

结构性问题值得关注

当前，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还存在“温差”。深入剖析可见，金融支持扩大内需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亟待系统性破解。

对居民而言，促进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金融支持机制尚不健全。消费是最终需求。目前，住户贷款呈现结构性分化，中长期贷款保持稳健，但居民对短期消费贷的需求增长迅猛，部分银行尚难以满足。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等还面临征信记录有瑕疵、缺乏有效抵押物、收入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强等现实约束，传统信贷模型对此亦难以覆盖。同时，消费金融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场景嵌入层次不足，与教育、养老、健康、文旅等消费升级领域相匹配的信贷金融工具和差异化风险定价机制不足。

对企业而言，促进投资、敢投资、投得好的中长期资金供给仍存缺口。扩大内需离不开有效投资的带动。2025年前11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5.36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增加8.49万亿元，制造业技术改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融资需求旺盛。但调研发现，大量中小制造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然面临融资期限错配的困难。银行偏好于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但设备更新、产线智能化改造等往往

需要更长周期的资金匹配。这一结构性期限错配推高了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并导致投资决策短期化。这造成企业“想投”的意愿、“能投”的能力与“投得好”的效能之间，存在中长期资金供给缺口。

对金融机构而言，愿放贷、能风控、善服务的动力和能力有待提升。当前，商业银行普遍面临净息差收窄、不良资产生成压力上升的双重挑战。2025年第四季度，多家银行密集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挂牌转让信用卡透支、个人消费贷款等类型不良贷款，反映出零售信贷资产质量管理承压的情况。虽然近几年持续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但风险认知调整、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智能风控模型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取得成效仍需时间。在目前条件下，金融机构对消费信贷、小微贷款、科创贷款相关长尾客群服务的风控成本显著高于标准化业务。

系统性发力提升质效

破解上述难题，显然不能仅靠零敲碎打的局部调整，而是需要推动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导向、以风险共担机制为保障、以增强中长期投融资匹配能力为重点任务的系统性改革，推动金融资源从短期流动性供给转向对制造业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消费场景创新的中长期支持，从标准化信贷投放转向精准化、差异化支持。

强化协同，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是提升金融支持扩大内需效能的重要前提。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5%左右，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举措是上调预期的关键。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一方面，在现行再贷款框架下拓展定向支持功能。探索创设消费领域专项再贷款工具，或在现有结构性工具中单列消费信贷支持额度，定向支持金融机构发放汽车贷、家居焕新贷款及县域商贸流通贷款。另一方面，推动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基金下沉。考虑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依托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因地制宜建立消费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对商业银行发放的信用消费贷按实际损失给予阶梯式补偿，并与征信体系建设

联动，避免道德风险，切实消除银行“不敢贷”顾虑。此外，还需优化监管考核“指挥棒”，可考虑将普惠型消费贷款增速、县城及农村地区信贷可得性等作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纳入普惠金融服务效能评估体系。

深化改革，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扩大内需的能力。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是政策落地的重要载体，有效提升金融机构能力十分关键。一方面，可向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从“抵押依赖”向“信用驱动”转型。依托持续完善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形成覆盖各类经营主体的数字信用画像。在此基础上，制度化推广“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用款模式，常态化压降小微企业融资周转成本；精准对接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12月发布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依法依规开展信用信息调整，切实落实“免申即享”要求，为符合条件的短期逾期主体提供高效、公平、可预期的信用重建通道。另一方面，审慎拓展消费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合规路径。考虑支持商业银行在依法履行独立风控职责前提下，与持牌科技公司依法依规开展安全可控的技术协同，探索基于真实交易背景的信贷服务优化。

完善生态，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统筹兼顾、多管齐下。一是可考虑共建相关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各部门消费促进政策、各地商圈活动、重点企业促销信息、金融机构优惠产品等，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难题。二是创新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可支持商业银行依托县域法人银行机构设立县域普惠金融专营机构或特色服务网点，在严格遵循审慎监管要求、独立运用自身风控模型开展授信决策的前提下，结合地方配套建设冷链物流、电商直播基地等基础设施，形成“资金+技术+渠道+品牌”的帮扶机制，同步健全“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市场化、现金流稳定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社区型购物中心、标准化社区商业中心等纳入消费金融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盘活存量、撬动增量。（来源：《经济日报》）

依托新质生产力引领职业教育新发展

□马金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的部署，广西“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的要求，从国家层面和广西层面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擘画了蓝图。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重塑产业与人才格局，既是职业教育开展系统性、前瞻性变革的内生动力，也是破解职业教育深层次结构矛盾的重要引擎。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对职业教育的时代要求

新质生产力对于提升职业教育质效、增强职业教育系统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

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的融合迈向更深层次。广西“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的突破”的主要目标，职业教育必须顺势而为，积极布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前沿产业集群，着力构建与科技创新浪潮同频共振、迭代演进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将最新技术成果转化为育人资源。

职业教育与产业升级的对接实现更高精度。广西正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职业教育要回应时代需求，建立及时响应需求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的深度耦合与无缝衔接，使人才培养精准匹配产业发展脉搏，更好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协同展现更广阔视野。广西迫切需要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快打造向海经济，推动构建陆海相通、多区联动的开放发展新格局。职业教育应聚焦重大方向，培养既精通技术技能，又熟知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彰显职业教育的担当与价值。

清醒认识广西职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推动广西职业教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短板交织。

从机遇看，战略叠加汇聚强大发展势能。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为广西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资源支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为广西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大力推进，为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丰富载体和鲜活场景。

从挑战看，结构性矛盾仍是主要制约因素。体系结构有待优化，职普融通机制不畅，中职、高职、本科教育衔接存在断点，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完全贯通；办学特色有待彰显，部分院校专业设置同质化，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贡献度有待提升；师资队伍有待加强，“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能力结构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开放水平有待提高，特别是面向东盟的职业交流合作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创新能力有待激活，应对产业快速变革、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推进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

推动广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关键环节，实施一系列创新举措。

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同频共振的职业教育新格局。立足广西建设“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任务，优化职业教育空间布局。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需求，布局建设若干区域性产教融合共同体。针对重点产业集群，布局建设若干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正面清单”引导与“预警清单”退出管理。支持职业院校聚焦与区域主导产业高度契合的特色专业群，打造“一校一品”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智慧校园、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管理与评价全过程。

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的育人机制。完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产业学院、高水平实训基地、技术技能创新中心。推广“园区办职校”模式，在重点产业园区嵌入职业院校或专业教学点。探索建立校企协同技术攻关机制，支持院校与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共享知识产权，推动企业出题、院校解题、政府助题协同创新，使职业院校成为区域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场域。

共建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平台。擦亮“留学广西”品牌，推动教育资源“出海”。与东盟国家共建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课程资源“走出去”。合作开发与国际广泛对接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共同深化学历互认、学分互换改革。携手开设“小语种+专业技能”特色方向，培养精通东盟国家语言、熟悉当地产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合力建设数字化平台，促进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素质，落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设立“产业导师”特聘岗位，广泛吸引企业工程师、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到校任教。深化教师评价改革，突出实践技能、专业教学能力和技术贡献的评价导向。构建教师发展联动支持体系，建设一批高水平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完善新质生产力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保障机制。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多部门协同发力，深化多元办学格局，营造良性生态。拓宽社会办学渠道，完善技能人才待遇保障制度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凝聚融合发展共识。（来源：《广西日报》）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具有战略意义

□邱锐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科技创新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以及长远竞争力的关键变量。2025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旨在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这一重大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效有力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科创中心建设成就斐然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占据引领和支配地位、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发挥显著增值作用的城市或地区，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等功能，呈现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活跃、科技创新能力强、科技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积极谋划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发挥其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三大中心建设启动以来，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产出一批原创性成果，集聚形成若干先进制造业集群，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跃居全球首位。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三地具有很多共性，同时又各具优势。北京集聚优质科教资源，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突出，在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等方面成效明显；上海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

创新“双轮驱动”，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力争成为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自主创新战略高地和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改革开放前沿优势，正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功能和定位上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协同并进的态势。

扩围提质势在必行

当前，科技创新已进入高度复杂化、系统化阶段。无论是原始创新突破，还是关键技术攻关，抑或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都需要多类型要素协同发力。新形势下，以单一城市为主体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模式，虽然在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显现出空间承载能力不足、产业转化受限、创新链条不完整等问题。纵观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上都依托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式运行，国际科技竞争正在由单点比拼转向体系竞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不仅在于规模上的扩张，而且在于创新体系能级、全球链接能力、规则塑造能力的同步提升，体现出建设逻辑的显著变化。一是从促进要素集聚转向推动体系协同，更加注重区域内创新资源的系统集成、功能分工和协同运行，关注提升整体创新效能。二是从提升科研能力转向提升综合创新能力，更加重视三大中心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带动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三是从聚焦城市竞争转向凸显国家战略，通过在城市群层面统筹科技创新布局，有效引导区域差异化发展，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安全性和效率。

相应地，在建设过程中应明确三个重要取向。一是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提升综

合竞争力，通过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统筹创新资源，构建多节点协同、功能互补的创新网络。二是以原始创新能力和颠覆性技术策源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力争能够持续输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原始创新成果和关键技术。三是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链接能力，将国内创新体系深度嵌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合作中提升影响力、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采取务实举措应对挑战

扩围后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承担着重要使命，既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形成策源优势，又要在国际科技合作和规则制定中提升引领力。目前，三大中心建设还面临一些挑战。

就京津冀而言，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中间环节仍然薄弱，原始创新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转化不足，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制度成本仍然较高，尚未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创新共同体。就长三角而言，在基础理论突破、颠覆性技术策源方面还存在短板，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能力有待增强，区域内部分分工还不够清晰，在创新链关键环节的分工协作和资源整合上仍有提升空间。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科研投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有欠缺，高端原始创新成果供给的持续性有待增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特殊条件，使其在法律体系、科研资助、税收政策、人才管理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客观上影响了区域整体创新效率和协同深度。

下一阶段，应统筹推进三大中心建设，明确差异化定位，通过建立跨区域的战略协同机制，在重大科技任务、国际合作平台和全球科技治理中形成合力，推动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由“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引领”。

京津冀需以强化原始创新提升全球创新策源影响力。依托北京密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冀冀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多点支撑、网络协同”的基础研究体系，持续在量子

信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输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以扩围弥合成果转化的“中间断层”，将中试放大、工程化验证等功能更多布局在天津、河北，构建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制度的国际化水平，在科研经费跨区域使用、科研人员流动、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对标国际通行规则，降低国际科研合作和跨国研发活动的制度成本，增强对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的吸引力。

长三角需以系统集成能力塑造工业创新引领力。在巩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长期投入，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技术路线和产业标准；以扩围优化区域创新分工与协同机制，统筹长三角省市的创新布局，明确不同城市在创新链中的功能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形成“研发在上海、工程化在周边、规模化制造在腹地”的高效协作模式；提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科技金融和科技服务业，增强对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配置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需以强化国际联通放大开放创新优势。推动制度创新，在科研资助、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管理等领域推动粤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探索设立跨境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的制度试验区；补足科研短板，增强原始创新供给能力，布局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和联合研究机构，引导更多长期性原始创新科研项目落地，提升大湾区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策源能力；充分发挥香港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功能，依托香港在国际科研合作、科技金融和法律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内地创新成果通过香港实现国际化转化，增强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可见度和影响力。

通过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协同布局、分工协作，我国有望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形成多极支撑、梯度衔接的战略格局。（来源：《经济日报》）